

新方向,新在哪里?

刘笑敢

2009年是唐君毅先生诞辰百周年及中文大学哲学系创系六十周年,本系举办了一系列纪念活动,包括竖立唐君毅先生雕像和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见本辑“会议录”)。本刊第五辑刊登了余英时先生撰写的《唐君毅先生像铭》,本辑则刊登了余先生在唐君毅先生铜像揭幕仪式上的录像致辞记录稿。致辞中高度评价了唐先生对香港之哲学教育与中国文化在国际社会的传播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另一篇特稿是孟旦(Donald J. Munro)教授在我系举办的纪念唐君毅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主题演讲。和一般的学术论文非常不同的是,此演讲以哲学家的角度观察和分析金融海啸所带来的启示,将认知科学和进化心理学引入伦理学思考,对中国和美国的经济与伦理问题作出了独特的观察和分析。在多方面反思金融海啸之教训的同时,孟旦教授特别强调 foreknowledge(事前知识)的重要性,主张企业和政府保证将风险与利益两方面的事实性知识公布于社会和人民,保障人民对自己的事务和利益有做出全面判断的依据。孟旦教授的这种思考角度和现实关切由来已久。2006年,他来中文大学作钱穆讲座时,就提出中美两国应该合作发展清洁能源和控制碳排放的技术。这一观点在奥巴马今年11月访问北京时与胡锦涛的共同声明中得到了反映和肯定。因而,本刊特别邀请孟旦教授就此作了一个简单的评述(见“回音谷”)。

1997年,孟旦教授送给我一本新著 *The Imperial Style of Inquiry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20世纪中国的帝国式求索模式》)。我看后曾问他,为什么在第五章中引用了很多报刊的非学术文章。他回答的大意是:中国的传统是重视知行合一,而不是纯理论思辨,所以研究中国当代思想也应该注意它与实际社会生活的联系,报刊正是真实生活的某种反映。可以说,注重社会现实问题及现代科学发展新成果与中国哲学研究的结合,是孟旦治学的特点和方法,也可以说是中国哲学研究的一个新方向。

新方向的说法来自于纪念唐君毅百年诞辰之际重新提起的一篇文章

章《中国哲学研究之一新方向》。唐先生所说的一个新方向即“视中国哲学传统之为—独立之哲学传统,而加以了解研究之方向”。这就是中国古代传统不自觉、而20世纪出现的以客观研究为主的新方向。与此同时,本辑以简帛资料对中国思想和哲学研究之启示为主题,也可以看做一个新方向。这样看来,中国哲学研究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新方向。不同的方向当然可以并存,可以互相影响,但新方向应该是自觉意识到的努力方向,而不应该是茫然不觉地沿袭某种传统。从这个意义来说,新方向之新的重要一面就在于对方法和未来之自觉意识,是对研究方法、学术标准和未来趋向的一种自觉性。这也是本刊历来所强调的有关研究方法的自觉意识。

本辑的主题是简帛文本研究对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的启示意义。这一课题是笔者主持的香港政府资助的研究计划的一部分,希望通过简帛资料的研究为中国哲学和思想的研究提供新资料以及方法上的新启示。笔者的文章是依据简帛文献的发现来检验以葛瑞翰(A. C. Graham)和钱穆为代表的《老子》考证的前提条件。文章提出(1)以所谓“思想线索”为根据推断作者和年代是不可靠的,(2)假定所有存在过的书都被同时代著作引用过而且会流传到今天是不成立的,(3)以所谓合理猜测为根据进行的考证是没有可靠性的。

顾史考(Scott Cook)的文章则以“喜新”和“守旧”为譬喻,批评在简帛研究中偏爱以简帛文献为可靠根据或倾向于根据传统文献为基准的盲目性和个人偏好,主张避免这两种心理障碍,尽可能全面客观地看到二者之长短得失,并以实例说明如何尽量做出合乎情理的判断。此文既有实例分析,也有理论概括,条理清晰,层次分明,是一篇好文章。

曹峰的文章首先从宏观的角度比较全面地讨论了出土文献对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价值,然后也分析了简帛文献研究的局限性,提出应该防止盲目夸大简帛文献的思想史意义,最后讨论了出土文献之研究方法的问题,特别是所谓“二重证据法”的局限,提醒大家注意出土文献的偶然性和不完全、不完善的特点。在材料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应该多闻阙疑,不急于下断言。

简帛文献研究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新兴的学术研究领域。在专门研究简帛文献之编联、释读、识字的热潮中,也有学者能够将简帛研究与传世文献紧密联系起来,以思想史研究为中心,深化对两方面的研究。李

锐的文章将上博简《诗论》与传世文献相对照,深入分析探讨孔子的“民性”之内容。梁涛则将对简帛资料和传世文献的分析结合起来,考察古代的禅让思潮。丁四新以简帛中新出现的文字为线索考察了从阮元到傅斯年、徐复观关于人性问题的解说,并依据竹简文献提出了新的见解。文章较长,分两期刊登。白奚和佐藤将之分别考察了先秦时期的“忠”和“忠信”的观念。二人的关切有部分重合,但方法观点有所不同,读者可以相互参看。陈丽桂是道家研究专家,她的文章依据出土文献重新梳理了先秦的道、气传统。陶红印是语言学家,对如何借用语言学方法和电脑辅助的分析来研究中国古代思想文献有长期的钻研。这里的文章是一个初步成果,可供进一步研究参考。我们应该看到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的不同,反对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标准来衡量和裁定人文学科,但是,人文学科也不应完全拒绝尝试借用自然科学的工具手段,不应该拒绝学习科学家不断探求事物客观真相的科学精神。

本辑也有两篇关于《庄子》研究的文章。陈金樑探讨了《庄子》中关于“无情”的两种理解,即以无情为圣人纯真自然之情,以及以无情为绝对超越。思考的角度也颇有新意。方万全是分析哲学专家,他关注的是道与技的关系,以西方哲学有关技巧的讨论和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相关内容为参照,厘清了道与技的关系,并说明以技艺的自然比用自然现象的自然更能说明道家圣人之自然的意义。这也是相当有见地的。本刊也将分两次刊登黄进兴关于梁启超之道德革命的研究。黄进兴是思想史和比较思想史研究的专家,他的文章对于我们理解近代中国伦理道德思想的变迁有重要启示。

本辑回音谷是德高望重的学者之间的辩论和对话,值得我们关注。争论可以回溯至本刊创刊号发表的劳思光先生的文章《关于“中国哲学研究”的几点意见》,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在第三辑发表了长篇回应文章,孟旦(Donald J. Munro)则在第四辑“回音谷”发表了对墨子刻之文的简短补充,本辑回音谷的重头戏则是墨子刻对孟旦的回答以及孟旦对墨子刻之回答的回答。作为编者,我非常高兴可以为哲学大家提供讨论的园地,并感谢他们对本刊的支持与厚爱。作为他们的老朋友和晚辈,我没有资格在他们的争论之间作评论或评判。但我要向读者郑重介绍他们的讨论,这是哲学大家以数十年的功力作基础的厚积薄发之作,读者可以从他们的即兴之作中看到数十年来的思想风云之变幻以及

背后的思路和动因。他们的辩论涉及当代新儒家的得失,功利主义的演变分疏,中西文化的冲突与会通,政治哲学的意义与功能,哲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等一系列既有现实性又有理论性的饶有兴味的话题。认真读之,必有收获。

感谢读者对本刊的支持,并欢迎更多的读者参与本刊的讨论。

附记:本辑有关简帛研究的十篇文章之酝酿、讨论、写作和编辑工作得到香港政府研究资助委员会(RGC)的专款资助(CUHK4573/06H),特此致谢。